

## 五、四时期的韩人题材小说中的叙事与对韩认识<sup>1)</sup>\*

### - 20世纪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变迁研究 (二)

藤田梨那 (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教授)

prina0211@hotmail.com

#### 目 录

-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对韩半岛的关注
- 二、 作品梗概与叙事手法
- 三、 作品的主题意识与对韩认识
- 四、 结论
- 参考书目

本论文是以“20世纪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变迁研究”为大主题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二篇。我们从中国作家的“韩人题材小说”的创作历史的角度，可以把20世纪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是清末民初时期；第二，以五、四为中心的二十年代；第三，三、四十年代；第四，以五十年代；第五，九十年代。这篇论文探讨的对象就是以五、四为中心的二十年代的韩人题材小说。首先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对韩半岛的关注问题，然后

---

1)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 Grant(KRF-042-A00064)" 本论文是以《20世纪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变迁研究》为大主题国际合作研究结果第二。

考察可以知道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情况的韩人题材小说几篇与鲁迅译序一篇，就每篇作品一一分析其作品梗概和叙事手法，而后对作品的主题意识与对韩认识进行探讨，最后作结论。

##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对韩半岛的关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结，和平会议在巴黎开幕，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并提出了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等要求。但因巴黎和会被操纵在英、美、法、日、意等列强国家的手中，是它们营利分赃的会议，所以中国的要求根本得不到正当的注意。列强各国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对中国提出的各项要求的讨论，对「山东问题」竟承认了日本对山东的接管和获得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凡尔赛和约」中分明地记载了有关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的规定。中国外交的失败、列强帝国的蛮横无理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不满和愤怒，1919年5月4日，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终于爆发了。

做为历史重大事件的五四运动，有关促使它爆发的诸要因，许多专著已作了基本相似的归纳，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壮大；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妥协所导致的外交失败；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蹂躏；中国人民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民族自决「十四条」的失望与愤怒；十月革命的胜利等。长期以来人们对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条件的理解基本上是在以上归纳范围之中的。这里并没有注意到韩半岛的独立运动。直到六〇年代末以后我们才开始看到一些涉及到三一独立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关联的历史专著和论文。如：

[中国]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79

杨昭全，《现代中朝友谊关系史的开端》，《世界历史》第三期，1979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日本]

小岛晋治,《三·一与中国的五·四运动》,《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17号,1980

小岛晋治,《中国近现代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

狭间直树,《五四运动序说》,同朋社,1982

小野信尔,《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社会与抵抗》,未来社,1982

[韩国]

李圣根,《韩国的三·一独立运动对中国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日文),《新韩学报》15,东京,1969

李龙范,《中国对三·一运动的反映》,《三·一运动50周年纪念论文集》,东亚日报社,1969

丁世铉,《从学生运动的角度看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三·一运动50周年纪念论文集》,同上<sup>2)</sup>

上举《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对中韩关系的认识虽还限制在初步的程度,但已将朝鲜的独立运动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列起来加以强调。文中指出:“1919年3月我们的邻国朝鲜爆发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对中国人民发生了特别亲切的感觉和影响,许多报刊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同情和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在这种形式下,中国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中略)广大人民联合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时,也只有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体会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只能靠中国人民的「直接行动」。”(页118)从反抗殖民统治这一层来看朝鲜的独立运动要比俄国的革命更切近于中国的现实问题,直接行动的三·一独立运动给了中国人民莫大的冲击和启发。以上论文均根据五四时期的历史资料具体地揭示了当时中国对朝鲜独立运动的关注和对朝鲜人民所处的悲惨现实的同情。在此我们再一次回顾历史,让至今人们未曾注意的一个历史的面影重新浮现出来。

三·一独立运动发生后,中国的进步人士、知识青年马上作出强烈的反映。3月16日

---

2) 韩国部分参考于朴宰雨,《韩国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之对话》,《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每周评论》13号以《朝鲜独立消息》的题目报导了独立运动的情况并分析了独立运动发生的原因。紧接着在3月23日《每周评论》14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文章开首说道：“此次朝鲜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我们对之有赞美、哀伤、兴奋、希望、惭愧、种种感想。”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对三一独立运动的感想是强烈而复杂的，他高度评价和赞扬了独立运动的意义，同时对运动的失败、朝鲜民众遭受的迫害感到痛心；通过三一独立运动看到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希望，同时回顾中国的现状，又不得不感到惭愧。

杂志《新潮》在4月1日登载孟真(傅斯年)的《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和穗庭的《朝鲜独立运动感言》。傅斯年在《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中说：“这次朝鲜的独立，就外表论来，力量是很薄弱的，成功是丝毫有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就内里的精神看起来，实在可以算得开革命界新纪元”。他的这段评价呼应了陈独秀的观点，但与陈比起来眼光显得更冷静，更沉着。他对这次运动分析出三层教训，第一，“是非武器的革命。”他知道被日本统治着的朝鲜人民是不允许持有武器甚至铁器的，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嘴，喊出自由的声音，用一双手来抵抗统治者的刀枪。第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革命。”朝鲜人民虽力量薄弱，仍能团结一致，竭民族之全力以抗争，傅斯年以朝鲜民众的这种毅力来反省自己，反省中国人瞻前顾后的弊病，指出“看看朝鲜人的坚强毅力，我们不真要惭到无以自容的地步了。”第三，“是单纯的学生革命。”他赞扬朝鲜的学生们不依靠武人和资本家的赞助，他们的举动是最纯洁最光明的。

杂志《国民》在1919年4月号上也登载了许德珩草于3月15日的《人道与和平》，强烈谴责日本对朝鲜独立运动的镇压。文章中说：“自民族自决之声浪播于全球而朝鲜安南咸思顺应世界之潮流以求自立，然窥观主张正义人道之和平会议诸公其对之则何如……日之于朝鲜也，其暴虐凄惨之淫威，恐又非二十世纪文明各国所曾习见。”许德珩以日本对朝鲜独立运动的镇压的事实来揭露列强帝国露鼓吹“民族自决”的真象，对朝鲜表示绝大的同情，对操纵巴黎和会的帝国主义给予痛切的批判。

三一独立运动引起了中国人民对邻国朝鲜的关注，这种关注基于中国人民切身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所以它是深切的，强烈的。对于朝鲜亡国后的处境和独立运动的失败，中国人民是深切同情的，但同时朝鲜人民的行动又成为中国人民反省自己的一面镜子，以此来激发中国民众的奋斗精神。

三·一独立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关系目前还没有被许多人注意和研究，韩国的朴宰雨教授认为三一运动“实在是五四爱国运动主要外因之一。”<sup>3)</sup> 实际上我们翻开历史便可了解到五四前后中国对朝鲜已非常注目。最明显的例子反映在‘山东问题’的认识上。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的消息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各界人士纷纷起来抗议。人们此时都以日本吞并朝鲜为前鉴，认识到朝鲜与中国国土相连，唇齿相依，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其野心在侵略中国、霸权亚洲。日本侵占山东便是要使山东沦为第二个朝鲜，从而向大陆伸展势力。人们疾呼“呜呼！是非奴隶我、牛马我、朝鲜我，使我山东父老子弟诸姑伯姐，永远沦为大陆之下，终无见天日之期乎？”<sup>4)</sup> “青岛去，山东失，全国将随之沦亡。四万万国民，被人作奴隶，……一如朝鲜之前鉴，永久不能恢复我自由。”<sup>5)</sup> 《天津学生罢课宣言》中也痛斥道：“埃及之亡，借款条约亡之也。朝鲜之亡，奸人卖国亡之也。今我中国二者备矣，国已亡矣，所未亡者民气而已。”<sup>6)</sup> 可见当时中国人民已对朝鲜的现实认识得很清楚，朝鲜就是中国的一面反面镜子，警告中国民众，不马上站起来抗争就会蹈朝鲜的覆辙，朝鲜确实成为激起中国人民国家危亡之危机感的实例。

另一方面，三·一独立运动也成为鼓励中国人民的积极因素。5月4日北京的学生们发表《北京学生界宣言》呼吁道：“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独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奋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sup>7)</sup> 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也提到朝鲜的独立运动，他说：“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在世界上可以说很不稀罕，但是在我们东亚，实在是不甚多见。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亚洲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sup>8)</sup> 周恩来明确地把朝鲜的独立运动看做亚洲民族革命运动的开端，肯定了其唤起国民自觉的伟大意义。

日本的小野信尔氏在他的论文《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通过对五四时期中韩的影响关系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即：“三·一运动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很大的冲击，以此为

3) 同上，页618。

4) 《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页211。

5) 同上，页258。

6) 同上，页314。

7) 同上，页310。

8) 《周恩来早期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页304。

转折点，朝鲜人民从中国的反面教材转变为正面模范，两国的友好连带关系有了飞跃性的发展。”<sup>9)</sup> 的确，三一独立运动后中国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重视朝鲜，从朝鲜民众那里得到了鼓励和希望，但应该注意到，从反面教训转变为正面模范并不意味着反面的那一部分就此消失，正如陈独秀在《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中所述的那样，朝鲜给中国的教训是复杂的、多面性的。三一独立运动以后朝鲜在中国人民眼里一直是包含了反面教训和正面模范的存在，朝鲜独立运动应是以这两个意义成为激发五四运动的主要外因。对此问题在今后的史学研究上还有待深入的探讨。

三一独立运动后，在汉城、俄国、上海成立了三个韩国临时政府。大批逃亡到中国的独立运动家和中国的革命家、知识青年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编写诗歌，话剧，如《高丽亡国史》、《安重根》、《朝鲜亡国恨》等。<sup>10)</sup> 1920年以后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中韩合作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中韩协会’，中韩的交往、协助深入民间，并具有了组织性的运作。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sup>11)</sup>

以上我们粗略地叙述了五四时期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中，中韩人民的交流已深入到民间，扩展到广大的中国社会。这样的状况自然也就为中国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条件和材料。在五四前后，中国的一些进步作家创作了描写韩人的诗歌和小说，在小说方面有鲁迅的翻译《一个青年的梦》、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台静农的《我的邻居》。在诗歌方面有康白情的《鸭绿江以东》、郭沫若的《狼群中一只白羊》、朱自清的《朝鲜的夜哭》、殷夫的《赠朝鲜女郎》等。

这些作品均以被殖民统治的韩半岛为描写对象，涉及到李朝的灭亡和朝鲜人民的独立运动，反应了五四前后中日韩的国际形势，也反应了中国作家对这种国际形势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从文学的角度反应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韩半岛的认识。本论文主要以上举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这些作品对韩半岛是怎样描写的，描写的手法如何？二是作品中反应了怎样的对韩认识？

## 二、作品梗概与叙事手法

9) 《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社会与抵抗》，未来社，1982，页66。

10) 杨昭全，《现代中朝友谊关系史的开端》，《世界历史》第3期，1979。

11)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页208。

本章基本上按照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介绍作品的概要，并着重分析作品的叙事方法与特点。

#### (一)、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载《新中国》第七期 1919年11月）

《牧羊哀话》以朝鲜金刚山麓的一个小村庄为舞台，以第一人称‘我’贯穿通篇。一个中国青年‘我’来到金刚山探胜，住宿在村民尹妈家里。一天他在山里看到了一位牧羊女子。听到了尹妈讲的关于这位牧羊女子的悲哀故事。牧羊女子原是尹妈曾服侍过的李朝子爵闵崇华的女儿闵佩萸。她与尹妈的儿子尹子英一起长大，彼此以兄妹相称。但子爵的妻子与子英的父亲秘密勾结，企图杀害子爵父女。被子英发觉，子英为保卫子爵父女，被自己的父亲杀死。闵佩萸在子英死后，接管他曾经看管的羊群，一个人到山里放牧。

郭沫若(1892~1978)是五四时期创作韩人题材小说最早的一位文学家。1919年3月朝鲜独立运动发生不久，他就写了小说《牧羊哀话》，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郭沫若的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最初发表在1919年11月《新中国》第7期上。有关写作时间，作者已在作品结尾及《创造十年》中作了说明，是在1919年2，3月之间。但我们仔细考证他所依据的资料便可推测出更准确的写作时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谈到《牧羊哀话》中对朝鲜金刚山的描写是根据了日本作家大町桂月的旅游记《金刚山游记》，而查《金刚山游记》的发表，则是在1919年3月1日杂志《中央公论》上。可知《牧羊哀话》至少是写于3月1日以后，也就是三一独立运动以后。再根据《创造十年》的记述，我们可以知道本作品的写作背景是多重性的，既有‘山东问题’，又有三一独立运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史实存在，那就是朝鲜李王世子李垠与日本皇族梨本宫方子的婚姻问题。

李垠是李太王的第三子，四岁时被封为英亲王，1907年，年仅11岁便随伊藤博文来日留学。实际上留学只是一个借口，日本为实现统治朝鲜的目的，把李垠带到日本来做人质。1918年12月5日，李垠与日本皇族梨本宫方子正式婚约。婚礼定于1919年1月25日，这个决定是在1919年1月17日的报刊上发表的。1月17日正是巴黎和会开幕的前一天。但不幸在婚礼的前三天，李太王突然去逝，李垠奔丧回国。1月22日以后各个报纸连日登载李太王葬礼的消息。三一独立运动在李太王的葬礼之际爆发。

《牧羊哀话》采用了双层的叙事手法，第一层是中国青年‘我’的叙事，既外层叙述，这个‘我’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分身。‘我’站在现在的空间和时间上，在金刚山麓，听尹妈讲述

朝鲜悲哀的故事，‘我’通过想像将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共鸣尹妈的故事。第二层是尹妈的叙事，既内层叙述。她站在过去的时间和空间上，叙述过去的一个特定场面的故事。闵佩蕙和尹子英便是第二层叙事中被叙述的人物。

这篇小说的特点在于尹妈的叙事的双重性和隐喻性。尹妈讲述闵佩蕙一家为何从京城搬到金刚山下来时说：

佩蕙小姐本来不是这里的人，十年前，她家住京城大汉门外。小姐的父亲闵崇华，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当时朝里，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定下了甚么合邦条约。闵子爵一连奏了几本，请朝廷除佞安邦，本本都不见批发。子爵见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便弃了官职，携一门上下，从京城里迁徙而来。（《郭沫若全集》第9卷，页7）

在这里，‘合邦条约’指1910年的‘韩日合并条约’，此条约签订后朝鲜便从此灭亡，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派奸臣’指李朝朝廷中的亲日派，‘外人’指日本人。尹妈的这段讲述强调朝鲜灭亡的内因是朝廷内部亲日派的卖国。再有一点，闵子爵后继夫人和尹妈的丈夫也是亲日派，尹妈的儿子尹子英是被他自己的父亲错杀而死的，他的死打破了他与闵佩蕙相怜相爱的幸福。小说中描写的亡国悲剧和恋爱悲剧都源于内部的背叛。尹妈的叙述说明悲剧的祸根不一定全在外部，内部的腐败、背叛会决定悲剧的出现。这里隐藏着另外一层含意，那便是影射中国政府内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出卖山东的背叛行为，暗示中国若失去山东进而被日本所奴役，那最终的原因必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子英是在6月11日被杀的，这一段叙事也是具有隐喻性的。这个日期暗示着什么？作品中曾三次触及到这个日期：1、第三节、“他就在那一年，被他的父亲杀死了”。2、第四节、闵李玉姬书信中的日期、6月11日。3、第四节、“我那英儿，他便在那年六月十一日的晚上死的”。本作品最初登载在1919年11月《新中国》上时，作者曾在‘六月十一日’之后插入注解：“朝鲜人便是现在也大概是用阴历。”这一条插在文中的注解，用语并非十分明确，读者或许会一读而过，不去忖度其中的真意。但其实在小说中作者特意用了具体的日期，并对此加上注解，这本身就反映了这个日期含有特别的意义，也许是因为作者受到当时社会形势的限制，不便把它明确地写出来。那么这个日期的真意何在呢？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六月十一日’是在哪一年。作品中有两处描写值得注意，第一处是第三节中尹妈的讲述。十年前闵子爵一家住在京城，“只因当时朝里，出了一派奸臣，勾结外

人定下了什么合邦条约”，这个合邦条约就是指1910年的“韩日合邦条约”。闵子爵弃官弃职，携全家搬到金刚山下来。这时子英12岁。第二处是第三节中，在金刚山下的高城“无风无浪地过了四年，我那英儿已经长到十六岁，闵小姐也长到十五岁上了。”“我的英儿，他就在那一年，被他的父——父亲——杀死了！”既子英是在从京城搬到金刚山四年后，16岁时受害的。综合这两处描写，可推证‘六月十一日’是1914年农历6月11日，换算到阳历后应是1914年8月2日<sup>12)</sup>。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期。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向保加利亚宣战，揭开了大战的第一幕，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使战火从欧洲漫延到亚洲。郭沫若所注目的山东问题早在大战开始的这个时期成就为德、英、日三国争夺的对象。日本为了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9月2日向青岛展开大攻击，占据了山东。根据这个史实，对《牧羊哀话》中的1914年6月11日(阳历8月2日)的解释出现了两个可能性，一是，它暗示着大战的开始。二是，暗示着9月2日日军侵入山东。(作品中虽然是8月2日)但考虑到‘山东问题’是激起郭沫若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个解释或许要比第一个更确切些。

作者在作品结尾部分设下了一个幻想的叙述空间，将双重叙事勾通交融在一起。

坟台全景，突然变成一座舞蹈场！场之中央，恍惚有对妙龄男女裸身歌舞。两人的周围恍惚有许多羊儿也人立而舞。又恍惚还有许多狮儿、豹儿、虎儿……也在里面。

恍惚之间，突然来了位矮小的凶汉，向着我的脑袋，飒的一刀便斫了下来！

(《郭沫若全集》第9卷，页14)

这里描写的是‘我’的一个梦境。场面由坟台变成舞蹈场；由一对男女的舞蹈变成群羊、群虎、群豹、群狮的舞蹈，舞蹈场中闯进一个矮小的凶汉，挥刀便斫。这场面不正隐喻着日本军镇压三一独立运动的情景吗？！作品中第一层叙述者‘我’站在现在的时间上，用梦境的形式将尹妈叙述的过去的事件与现在发生着的事件连接起来。梦中的‘我’也在坟台前，舞蹈场中，也被矮小的凶汉斫了一刀，这表示着‘我’的想像已与尹妈的叙事融合，‘我’也加入了不幸的朝鲜人的境遇，‘我’的感触也参与进去了，过去与现在在此连接。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自然不能公开地将自己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感触表露出来，他只能用梦境、隐喻的形式和手法把自己的心情表示出来。‘我’对朝鲜的感触是‘断肠地方，

12) 西泽利男，《新旧历月日对照表》，《历的百科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3。

伤心国土，可以说这也是郭沫若的感触。证明他对朝鲜是十分关注和同情的。

(二)、鲁迅翻译《一个青年的梦》(1919年连载于《国民公报》，1920年连载于《新青年》)

鲁迅(1881~1936)对朝鲜的关注也很早，作品方面与朝鲜有关的可以举他的翻译《一个青年的梦》。这是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916年连载在杂志《白华》上的作品。内容写一个日本青年在梦中被一个不相识的人带到阴间和其他地方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人们或失去亲人的人们见面，与他们讨论战争问题。作品译反战为主题，批判了日本对朝鲜、青岛的侵略，描写了战争的悲惨，提出以人类为基准的和平思想。

在中国最早介绍这部作品的是周作人，1918年5月，周作人在杂志《新青年》第5号上发表了题为《读武者小路实笃君作〈一个青年的梦〉》的文章，介绍了作品的情节，并对其反战精神作了积极的评价。鲁迅读了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后马上阅读了《一个青年的梦》，觉得很受感动并产生翻译它的想法。在《译者序》中他说：“《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意思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鲁迅全集》第10卷，页192)从这一段记述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对《一个青年的梦》的评价是很深切、认真的。

中文《一个青年的梦》于1919年8月至10月陆续发表在《国民公报》上，1920年1月又载于《新青年》第7卷上。这样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便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

鲁迅所译《一个青年的梦》是尽量保留原文文体的逐字逐句的译文，译文附有两篇译者序，这两篇序文是我们探讨鲁迅翻译这篇作品的动机和目的的重要资料。目前考虑鲁迅对《一个青年的梦》的翻译，最为有意义的在以下两点：一是翻译和发表的时间。二是对原作反战精神的宣传。对于这两点将在第三章中具体论述。

(三)、蒋光慈的《鸭绿江上》(载《创造月刊》第2期 1926年4月)

在二十年代后半时期，慧星一般地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蒋光慈(1901年~1931年)在世仅仅三十年，创作活动仅仅6年。但仅仅6年之间他写了大量的作品，《新梦》(1925年)、《少年飘流者》(1926年)、《鸭绿江上》(1927年)、《短裤党》(1927年)、《哀中

国》(1927年)、《纪念碑》(1927年)、《野祭》(1927年)、《菊芬》(1928年)、《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年)、《田野的风》(1931年)等,都是忧国、革命、反抗色彩极鲜明的作品。他的逝去就象一颗巨大的慧星拖着火红的光尾,向地球落去,将那巨大的火光掷向大地。我们今天读他的作品,几乎每一篇中都能够看到他生命的火光。

蒋光慈在二十年代初被派遣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他看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新面貌,他“全身、全心、全意识”地感受着革命后的气氛,他写了许多诗歌,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歌颂列宁。留苏经历对他的革命意识及文学态度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可以说留苏的几年时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1926年4月他在《创造月刊》第2期上发表《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这是在中国介绍马列主义文学理论最早的文章。与此同时,在《创造月刊》同一期上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鸭绿江上》。这是一篇描写韩半岛的作品,描写一位高丽青年的悲哀的恋爱故事。登场人物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四个留学生:一个中国留学生,叫维嘉,以第一人称‘我’主导全篇的叙事;还有一个中国学生C君;一位波斯学生,叫苏丹撒得;一位高丽学生,名叫李孟汉。中国、高丽、波斯,这三个民族在当时都受着列强国家的统治和压迫。(中国受着英、俄、德、日等国的瓜分;高丽已失去自己的国家,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波斯从19世纪以来一直受着俄罗斯和英国、德国的统治。)来自这样的国度的青年们会聚在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他们的宿舍设在一个尼姑院(修女院)里,一天晚上下了大雪,除了C君出去找朋友以外,留下三个人便围在炉火旁谈自己的恋爱经验。轮到高丽青年李孟汉时,他以悲哀的心情讲述了他的恋爱故事。李孟汉和他的爱人云姑是竹马长大的一对恋人,在鸭绿江口的C城里,他们俩渡过了无忧无虑的孩儿时代,从天真的友爱发展到有意识的相爱。但是他们的幸福却被日本统治者破坏了。李孟汉和云姑都是李朝贵族的后裔,‘韩日合并’后,他们的父亲就都辞掉官职,隐居林下了。不久李孟汉的父亲被日本统治者套上了暗杀日本警官的罪名,被逮捕并被杀害,他的母亲也投海自杀。一瞬间李孟汉成了孤儿,而且不久日本当局又要陷害他,于是他只好与云姑分手,渡过鸭绿江,向中国逃亡。他和云姑虽是难舍难分,但也希望以后终有再团圆之日。但云姑后来因参加反日运动,被日方逮捕,死在狱中。鸭绿江之别竟成了他们的永别。李孟汉得知云姑因死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发誓要解放高丽,为云姑报仇。

《鸭绿江上》的恋爱故事基本上与郭沫若的《牧羊哀话》相似,都是设定一个和平幸

福的境域被日本统治者破坏的情节，突出朝鲜人民的痛苦和悲哀。在叙事手法上《鸭绿江上》有一个特点，即是作者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如下面一段叙述：

唉！在十四岁这一年中，朋友，我的悲哀的不幸的生活算开始了。俗语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暂时的祸福。”在我们高丽，朋友，暂时的福是没有的，可是暂时的祸，说不定你即刻就可以领受着。你或者坐在家里没有做一点事情，但是你的生命并不因此就可以保险的。日本人的警察，帝国主义者的鹰犬，可以随时将某一个高丽人逮捕，或随便加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即刻就杀头或枪毙。唉！日本人在高丽的行凶做恶，你们能够梦见么？任你们的想像力是如何丰足，怕也不会想像高丽人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虐待到什么程度啊！（《蒋光慈选集》，页335）

上面是李孟汉的一段叙述。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时李孟汉处在叙述者的位置，而中国青年维嘉和波斯青年苏丹撒得则处在受述者的位置上。李孟汉的叙述很明显是指责了日本对朝鲜人民所施加的镇压行为，李孟汉的父亲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热心恢复高丽独立的人”。叙述中第二人称“你”“你们”在作品中指维嘉和苏丹撒得，但在作品外还指实际读者。作者的用意在于要用朝鲜悲哀的现实来暗示中国的将来。日本吞并了朝鲜，又以朝鲜为跳板，侵入到中国东北地区，偌照此下去，中国就会象李孟汉说的那样，“暂时的福是没有的，暂时的祸，说不定你即刻就可以领受着。”作者在此向中国人民敲着警钟。作品中的第二人称“你”“你们”包含了多数的中国读者。正像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在他的《作为修辞的叙事》<sup>13)</sup>讲的那样：“发自‘文本’的声音所称谓的那个你既是本文内的又是本文外的；它指的不仅是受述者——主人公，而且还有作为实际读者的你。”即“一个内在的文本的‘你’——受述者——主人公”与“一个外在的文本外的‘你’——有血有肉的读者”浑淆在一起。《鸭绿江上》的作者对李孟汉的叙述除了在文本中加进受述者的一些惊叹、愤慨之外，并未加上更多的议论，而主要让李孟汉一个人倾述、发泄他的激情，以第二人称“你”“你们”来吸引读者进入叙事中来，与文本中的受述者重合，同情和理解叙述者的境遇。

13) James Phelan, 《Narrative as Rhetoric》。这里援用陈永国译《作为修辞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页108。

《鸭绿江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地点的选择。作者将地点选在莫斯科，在当时，莫斯科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最光明、自由、幸福的地方，留学中他写的诗《红笑》《莫斯科吟》《劳动的武士》《十月革命的婴儿》等都表现了他对苏联的热爱。作者让三个不同国家的青年会集在莫斯科，让李孟汉叙述他悲惨的恋爱故事，作者的意图就在于要布置下一个对照的局势，即自由与不自由，自主与不自主的对照。作品的开首描写一个尼姑庵，即修女院，又点出时间是革命之后，但尼姑们还是传统的装束，传统的生活。中国留学生维嘉说她们是“不自由，枯寂，悲哀”的，这里出现的是自由与不自由、新与旧的对照。在革命后的莫斯科，留学生们谈论自己的恋爱经过，这本来是一个自由的境遇，但朝鲜留学生的恋爱谭又成了一个悲痛的、不自由的境遇，这又是一个自由与不自由的对照。在这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对照的实例：

- 1,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与代表革命前的尼姑庵。
- 2, 青年们的恋爱谭与李孟汉的悲恋。
- 3, 自由国度苏联与殖民地国家。(朝鲜、中国等)

上面三个对照都是从莫斯科这个地点上反射出来的。这种对照使作品的主题，即朝鲜被日本统治的悲哀，更加突出，更加深刻。而且这个主题还涉及到中国和亚洲的弱小国家与民族。

建国后，对蒋光慈作品评价比较早的，可以说是黄药眠的《蒋光慈选集—序文》(1951年)。黄氏对蒋光慈在文艺上的贡献举出了三点：第一是“在创作实践上替左翼文艺运动奠定了若干基础。”第二是为“文艺带来了一些新的题材和新鲜的人物”。第三是为“革命文学争取了许多读者，扩大了政治的影响。”

就《鸭绿江上》来说，特别是对第二点，我认为应再补充上一些成绩。黄氏在第二点中评价了在题材上蒋光慈注意到当时的各种重大事件，如学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奥汉铁路工人罢工、黄埔军校、上海工人的三次暴动、南昌暴动、湖南农民运动等；在人物上，注重描写工人、店伙、革命知识分子、地下工作者、农会领袖、叛逆的女性，把描写的范围扩大。我认为在题材上还应加上日本吞并朝鲜、朝鲜人民的反抗；苏联的革命、革命后的状况，即国际性的视野。在人物上，还应加上朝鲜青年。

可惜黄氏对《鸭绿江上》的评价仅是一句话：“这是光慈的比较完整的短篇小说。”（《序文》，页25）但实际上这部小说以莫斯科的地点，间接地传递了十月革命后争得自由的国度的气氛，并以此反映出三种对照，来突出它的主题。在情节构造上和叙事手法

上都反映了作者的周到精徹的旨意。是值得詳細研究和評價的。

#### (四)、台靜農的《我的鄰居》（《地之子》 1928年）

台靜農一貫以鄉土作家著名，第一部小說集《地之子》（1928年 未名社）中大多數作品都是以他的家鄉為題材的。魯迅曾評價它為“優秀之作”<sup>14</sup>。還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序言中，對《地之子》作了較高的評價。

冠於《地之子》之首的《我的鄰居》是一篇韓人題材小說，它通過一個中國青年‘我’的回忆和想像，描寫了‘我’和‘我的鄰居——一個朝鮮愛國青年同處的一段經歷。小說在題材上捉住了兩個歷史事件，即1923年的東京大地震和震後發生的朴烈事件。兩個事件把‘我’和‘我的鄰居’在回忆和想像的世界中連接在一起。‘我’在一個寒冷的早上從報紙上偶然看到了一個事件的報道：

我翻到第二版的時候，看見了一條關於日本的新闻，說有暴徒某，朝鮮人，謀炸皇宮，被警察擒住，已于某某日正法；該犯年二十餘歲，身材短小，面微麻……

（《地之子》，頁4）

這一段報道使‘我’想起了一年前往在隔壁的一個青年。一年前這個青年搬進‘我’隔壁的一間陰森的房间來，而且終日蟄伏在房间里，使‘我’感到莫名其妙。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有機會與這個鄰居搭訕，才知道他是朝鮮人，又知道他是經歷過1923年的東京大地震的。他們之間有下面的一段對話：

“府上是廣東吧？”

“不，我是朝鮮人，先生！”

“原來是朝鮮！”我帶了十二分的驚異與恍然的神情。（中略）

他原來是異國的飄泊者，不幸誤會竟生在我們的中間。

“先生來中國多少時間了？”

---

14) 魯迅，《二心我們要批評家》。

“去年日本地震后来的。”

“据说那次东京地震，你们韩人死了不少？”

“唔，是的。”

他用照旧一样的口吻答我，可是声音微微地颤动，他似乎已经知道我的意思，我不禁有些赧然了。他隐护他的伤痕，当同人们相遇的时候。(同上，页16~18)

他们的对话中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邻居是朝鲜人；另一点是东京大地震时朝鲜人死了很多人。这里所说的朝鲜人的牺牲不是指地震时的受难，而是指震后日本人虐杀朝鲜人的事件。大地震后在东京流传出许多有关朝鲜人的谣言，说他们往井里散毒、放火、杀人等。不久警察和市民的自警团便开始搜捕和虐杀朝鲜人。据统计当时被害朝鲜人达6600余人<sup>15)</sup>(13) 而且受到诬陷和残杀的不仅限于朝鲜人，还有许多在日中国人和日本劳动者、社会主义运动家也被残杀。翻开日本现代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对国内无产阶级运动所施加的一连串的残酷镇压。日本政府和警方在大地震发生后大量检举社会主义运动家，杀害了劳动会干部川合义虎、平泽计七等10人；逮捕和杀害了社会主义运动家大杉荣、伊藤野枝。日本政府一连串的逮捕、暗杀、虐杀，都是为了乘着震后的混乱，一举歼灭反政府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势力。日本政府的逮捕中还有反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家朴烈和金子文子。朝鲜人朴烈当时是无政府主义团体‘不逞社’的中心人物，大地震后他们马上被逮捕了，罪状是对日本政府强行的‘韩日合并’怀有强烈不满，偷运炸弹企图暗杀天皇和皇太子。当时朴烈25岁。1925年10月朴烈以‘大逆罪’嫌疑被起诉，同年11月对外报道开襟，人们才开始通过报道了解这个事件。1926年3月25日日本大审院判处朴烈、金子文子死刑。实际上朴烈的罪状完全是日本政府和警方捏造的，目的与上述对社会主义运动家的镇压一样，不外乎是要毁灭国内的革命势力。

台静农在《我的邻居》中涉及到东京大地震，让‘我’对朝鲜人的被害表示了同情。这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的惨杀朝鲜人事件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这个事件对朝鲜青年来说显然是留下了心灵上的创伤，他“声音微微的颤动”，“他隐护他的伤痕”，这些都表示了他心里的伤痕之深。一年后‘我’看到报纸上的消息时，便猜疑犯人就是这个邻居。‘我的邻居是怎样一个青年呢？’作品中这样描写：

---

15) 武田幸男，《朝鲜史》，山川出版社，页271。

人很短小，显得十分精悍，（《地之子》，页5）

他的神情使人一见面便有些奇怪，脸上微微有些麻，双眉如两把短刀，往下威着；身体并不雄壮，然而非常的精悍；他的头发已经秃顶，却不像一个秃顶的老学者，还是少年的英姿。他宛然是一只饥饿在腹中燃烧的鹰。长开眼睛四望之后，双眉便立刻攒聚起来了。（《地之子》，页11）

朝鲜青年的特征是矮小而精悍，有一双尖锐的眼睛。他的动作带有强烈的冲击感，致使我怀疑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或大盗。这个朝鲜青年的形象与朴烈有相似的地方。金一勉在他的著作《朴烈》<sup>16)</sup> 中谈到朴烈的性格说：“综合当时有关朴烈的记录，可以判断朴烈是一位不大说话，沉着到带有一些可怕的威严。他决不献媚于世间，而总是正大光明的。对外显出大胆的强行的性格。”（《朴烈》，页54，笔者译）再看朴烈在狱中的身体检查报告：“朴烈(25岁)身高5尺2寸2分(1米58公分)，体重42.75公斤(中略)体瘦、营养不良，发浓，眉浓。额圆而宽。”（《朴烈》，页212）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朴烈是一个个子矮小，眉毛浓厚的青年。朴烈的性格是比较剧烈的，据说他本来的名字叫朴准植，八岁的时候自己把名字改为朴烈，理由是自己的性格太剧烈。<sup>17)</sup> 《我的邻居》中的朝鲜青年在体形、面貌和性格上都反映了朴烈的特征。他的强烈的性格表现在一双尖锐的眼睛上。作品中有几处描写他的眼光的地方。

当他在院中格格地徘徊的时候，曾经冷然地向我一瞥；从这一瞥之后，他的恶毒确已穿进我的血管中，在周身轮环地跳动着；（《地之子》，页13）

他昂然地冷峭地向我一瞥；（页17）

他冷然孤独地微笑了，很严肃地对我一看，（页18）

他闪闪的眼光，有如闪电一般四射，大概是要图来日的复仇吧，我想。（页19）

16) 金一勉，《朴烈》，合同出版社，1973。

17) 森川哲郎，《朝鲜独立运动暗杀史》，三一书房，1976，页221。

朝鲜青年的眼光传递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我’从中读出的是恐怖、愤恨、凄怆和复仇。小说中的朝鲜青年是一个异国的漂泊者，潜伏在‘我’的隔壁，秘密地准备复仇。一年后在报纸上出现了‘朝鲜人，谋炸皇宫’的报道。这个朝鲜青年通过几个重要的事件——东京大地震、朝鲜人虐杀事件、谋炸皇宫——的连接，俨然显现出一个近似朴烈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我的邻居》中对朝鲜青年的刻画主要是通过‘我’的眼光和连想，用了一种自由连想的意识流的手法。在第1节中，‘我’以一个懒散、怯懦的大学生登场，在‘我’的懒散、缓慢的动作中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意识的流动。

我斜倚在藤椅上，负着阳光使全身温和与舒畅，正如一个老人在阳光之下消失他的末日；我手里拿了一支烟轻轻地吸着，烟气弥漫了这矮而小的房间，与阳光互相辉映，顿使我回到过去的梦境与寥廓的远天，心是象狂风中的波上的小舟一样，荡漾得不能自安，正如老年人在他末年的回想的国土里得到的不安和悲怆。（页2）

‘我’的意识随着烟气的弥漫开始波动起来，但波动是被动的、消极的，还只是一种潜在的运动，所以‘我’还不能捉摸到它的真象。但到他看到报上登的朝鲜人谋炸皇宫的消息时，这个意识的波动便开始显出明显的影像。

我的心因而又回落到方才不安的状态中了。

我扔开报纸，两目凝视着虚空，青烟同阳光绕着我的左右，我不愿深思下去，只是他偏引了过去的许多景象一齐奔驰到我的脑里。（页4）

一个朝鲜青年的影像浮现在‘我’的意识中，一年前这个青年刚搬到‘我’隔壁来时，‘我’还不知道他是朝鲜人，‘我’对这个邻居的想像是：学生军(第2节)→广东人→理学家(第3节)。“我”对邻居产生了好奇心。但第二次看见他时，从他那严厉的神情，尖锐如鸷鸟一般的眼睛，破烂的装束，‘我’的想像又有了变化，这回是：一只饥饿在腹中燃烧的鹰→决不是老实人→危险人物→江湖上的大盗→魔鬼(第四节)。“我”的感觉从好奇到恐怖。‘我’第3次见到邻居时大胆地开口打了招呼，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一位朝鲜人，而且知道他经历了东京大地震，这时‘我’对邻居的想法完全不同了。小说中这样写道：

我无端地感到我这不幸的邻人身世的悲哀，他怎样地遭遇恶人的毒手，他怎样地逃开恶人的罗网，他含泪地别了祖国，别了慈母，别了他的爱人！

他如一只大鸟，暂时虽然脱了猎人的逼迫；使他在无尽的天空中飞着飞着，也就足以使他愤恨和凄怆了；所以他闪闪的眼光，有如闪电一般四射，大概是要图来日的复仇罢，我想。（页19）

这时‘我’的猜疑、好奇、恐怖的感觉都消失了，代之而来是理解、忏悔与同情。‘我’的连想是：朝鲜人→异国的漂泊者→东京地震→虐杀朝鲜人→邻人身世的悲哀→一只大鸟→复仇。对于‘我’来说，朝鲜青年的蛰伏、令人不解的行动、严厉的神色，都是为了图谋复仇。对朝鲜青年的身世和复仇心的同情，反过来就是对压迫朝鲜青年的人的痛恨。一天晚上朝鲜青年突然被警察逮捕了，这时‘我’的感情是愤怒、焦灼、火焰狂烧(第6节)，‘我的意识清楚地喊出’我的愤怒：“我要痛恨这群野兽们将我的不幸的异国朋友掠去了！”一年以后‘我’看到报上的报道时，回忆和想像又涌上心头，‘我想：“这是不是你呢？为了你沉郁的复仇，作了这伟大的牺牲，我的不幸的朋友！”（第6节）在「我」的心里，朝鲜青年已不是“彼此不注意”的邻居，而成为异国的朋友。

这样看来，《我的邻居》的描写并不在于朝鲜青年的具体行动，而着重在「我」的想像意识的变化。‘我’对朝鲜青年的想像从开始的无意识的状态逐渐变化到清醒的认识，最后把这个邻居看成自己的朋友，对他表示了很深的同情和支持。

### 三，作品的主题意识与对韩认识

第一章中我们回顾了五四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高扬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山东问题’处理上的外交失败，这些大事件都是激发中国人民觉醒的重要因素。同时朝鲜的亡国以及那以后悲哀的命运也给中国人民提供了警和反省的反面、正面两面镜子。在文学作品方面也鲜明地反映出了这个时期的特色，第二章中所举的诸作品在描写的时间和空间上，在主题意识上都与五四时代的社会背景、国际关系紧密关连，既有共同的时代认识，又呈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而他们选择的时空，

他们所持的主题意识又反映出了他们对朝鲜的认识。

#### (一)、从作品背景与主题意识反映对朝鲜的关注

上举诸作品的背景基本上都限制在朝鲜亡国以后。既从1910年的日韩合并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被描写的朝鲜人大多是从朝鲜逃亡出来的流亡者；弃官引退到乡下的老官员；不得不忍受悲苦的少女。这样的人物设定反映着日韩合并和三一独立运动以后的朝鲜的状况，作家们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朝关系是很重视的。

郭沫若《牧羊哀话》的写作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山东问题’，但通过详细的作品分析，证明作品的写作背景是多重的，除了‘山东问题’外，还有李王世子李垠与日本皇族方子的婚姻问题、三一独立运动和日本对青岛的侵略。有关‘山东问题’，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已作了回忆。后三个事件虽然作者没有作任何申明，但却隐现在作品中，与作者的写作意识有着极密切的关连。

巴黎和会与李垠的婚约这两个事件都在1919年1月发生。规模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日本无视对方国家的主权。对中国人民来说‘山东问题’直接威胁到自己国家的主权。李垠的婚姻又告诉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主权和自由的国民的悲惨。他从这两个事件看破日本的野心。正因为当时郭沫若留学日本，对做为人质居留在日本的李垠身边的动向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李垠的婚姻事件是激发郭沫若构思朝鲜少年少女尹子英和闵佩萸悲恋故事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巴黎和会煽动了他的爱国之心，李垠与方子的婚约、被破婚的闵甲完的不幸又打动了他的诗人之心，使他为朝鲜落泪。

日本攻击青岛，在作品中则是以主人公尹子英被杀的日期暗示出来的。如第二章中所分析的，《牧羊哀话》的悲恋从子英受害开始，子英被杀的6月11日，阳历8月2日(或9月2日)又是中国山东受难的日子。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夺取了满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又来夺山东，企图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朝鲜。所以子英被害的日期不是作者随便设定的。郭沫若为了暗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特意把子英被杀的日期设在阴历6月11日，以此双关了两个历史事件。这个日期可以说是表现作者反日感情的一个重要的焦点，也是贯穿全篇的两个写作意图即悲恋和反日相交融的一个重要交点。

鲁迅翻译《一个青年的梦》也是在1919年8月初着手的，到1920年截止译文全部发表

出来。这一段时间中夹杂的中外大事件有：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三一独立运动、五四运动。鲁迅的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翻译和发表的时期针对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但与郭沫若不同的是他对国际形势的思考经过了一番周折和反思的过程。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中他谈到开始翻译的一段经过：8月1日「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来要求鲁迅写文章，鲁迅回答：“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但当这时候，不很相宜，两面正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鲁迅全集》第10卷，页193）‘两面交恶’即指中日两国对山东问题的争执。鲁迅虽然很感翻译这篇作品的必要，但还担心不和时宜，怕不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和注目。但最终鼓励他决意翻译的还是武者小路实笃的抵抗精神和周作人对武者小路实笃的共鸣。

在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这部作品发表后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他在《自序》中谈到：“日本对这次的战争，大概并非神经质，我也被一般人所无视、所轻蔑。所以这部作品没有得到反对的反响也许也是当然的事。”（《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2卷，页499）《一个青年的梦》发表出来的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当时日本国内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士气国势都倾向于侵略战争，一般国民正沉浸在歌颂战争的热潮中，所以武者小路的作品没有被人们重视。但是武者小路对此采取的态度是：“我也知道说出来也没用，但是不说更觉得不释然，做为艺术家不说出来就难免要憋在肚子里难受，我作这书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同上p499）在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下，武者小路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不适事宜的了，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把反战的意图表示出去。

周作人对武者小路的这种精神很感动，在《读武者小路实笃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中说：“觉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必要：虽然力量不及，成效难期，也不可不说，不可不做。现在无用，也可播个将来的种子；即使播在石路上，种子不出时，也可聊破当时的沉闷。使人在冰冷的孤独生活中，感到一丝的温味，鼓舞鼓舞他的生意。”还赞扬说：“明知‘说也无用’，然而不能不说，因为还有对于人类的这‘爱’存在。”鲁迅对这一点也有同样的感触。在‘译者序’中鲁迅提及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并写到“晚上点上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本该这样做，——我便动手翻译了。”（同前）他通过回味武者小路的作品，反思自己瞻前顾后的态度，觉得自己是错了。在当时日本得意忘形的时刻，武者小路敢于站起来对日本侵略朝鲜和青岛进行大胆的批判，鲁迅对此很受鼓舞。他肯定武者小路的信念和精神是正确的，值得学习的。《一个青年的梦》的翻译体现了鲁迅对自己的反省和对当时的

日中、日韩关系的关注。

蒋光慈的《鸭绿江上》以朝鲜被日本统治后的悲惨历史为描写背景。主人公朝鲜青年李孟汉的经历——父亲被杀、只身逃亡、与恋人生离死别，这些不幸都因日本的残酷统治所至。李孟汉说：

高丽自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吞之后，文雅的高丽国民沉陷于无涯际的痛苦里，日本人将高丽闹得充满着悲哀，痛苦，残忍，黑暗，虐待，哭泣……日月无光，山川也因之失色。（《蒋光慈选集》，页324）

作者将视角放在朝鲜亡国之后，刻意描写出惨遭压迫而不得反抗的朝鲜人民的悲哀。

台静农的《我的邻居》则以1923年的东京地震、在日韩人虐杀事件、朴烈事件为背景，反映朝鲜人民在日本国内遭受残酷迫害的状况。作者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个谋图复仇的朝鲜青年：

一条关于日本的新闻，说有暴徒某，朝鲜人，谋炸皇宫，被警察擒住，已于某某日正法；该犯年二十余岁，身材短小，面微麻……。（《地之子》，页3）

叙述者‘我’与这个青年的对话中触及到东京地震：

“先生来中国多少时了？”

“去年日本地震后来的。”

“据说那次东京地震，你们韩人死了不少？”

“唔，是的。”（《地之子》，页17）

前章已分析过，这个朝鲜青年是在东京地震和虐杀在日朝鲜人事件发生后逃亡到中国来的。而朴烈事件正是发生在大地震以后，与日本政府镇压日本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连。朝鲜青年以朴烈的形象登场，反映了作者对在日朝鲜人民的关注与同情，也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镇压者的愤怒。

## (二)、同情与自警同在

五四时期的韩人题材小说基本上都将描写的焦点集中在日韩合并之后的朝鲜，呈现出作者对朝鲜被压迫的悲惨状况的同情，但他们对邻国的感情中还包含了很大分量的忧国的情绪和自警的意识。

郭沫若的《牧羊哀话》描写闵佩萸失去恋人尹子英，不得不代替他亲自牧羊的悲哀故事，以羊群失主的悲哀来表现朝鲜的亡国。中国青年‘我’最后悲痛地说道：“象这样断肠地方，伤心国土，谁还有铁石心肠，再能够多住片时半刻呢？”倾吐出作者对朝鲜的深切的同情。同时作者还用了暗示的手法将中国与朝鲜连接起来。作品通过尹妈的讲述，揭示了朝鲜亡国的重要原因在于朝廷内部亲日派的卖国，同时也暗示了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失败源于中国政府内的亲日派的背叛。尹妈的儿子英被杀的日期也含着双关的意义，6月11日这个日子是子英被自己的父亲——亲日派——所杀的日子，同时它还暗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对青岛的侵略。很明显，作者将朝鲜的亡国与中国的被侵略连接在一起，以朝鲜为反面镜子，担忧中国的未来，他很敏感地察觉到日韩合并后走上亡国之路的朝鲜正在暗示着中国的命运。朝鲜人民的痛苦就是中国人民的痛苦，作者对朝鲜抱有深切的同情和连带意识，而且这种同情和连带意识通过作者丰富的想像，以虚构的形式被具像化，同时带来了一种悲哀的美的效果。

前章已提到鲁迅的翻译《一个青年的梦》有两个重要意义，一个是翻译和发表的时期的意义；一个是对原作的反战精神的宣传的意义。第二个意义当中就包含了鲁迅对朝鲜的同情和对自我的反省，这种同情和反省是通过对武者小路的反战思想的认同反映出来的。

《一个青年的梦》第一幕中日本青年被一个不相识的人带到野外去，参加了阴间的和平大会。与会的除了这个青年以外都是在战争中丧生的鬼魂，有死在战场上的士兵，有死在外国侵略者手上的老百姓，有年轻人，也有老人，还有女人和孩子。他们纷纷诉说战争的恐怖、死亡的痛苦。下面引用鲁迅的译文中一段鬼魂的述说：

南阿的战争，是英国之耻。青岛的战争，是J国之耻。E国对印度人的办法，应该反对。J国对朝鲜的办法，也是僭越的。即使印度、朝鲜没有独立的力量，然而竟用了怕教这国兴盛似的办法，是可耻的。俄国、德国、奥国对波兰的态度，也是可耻的。不自然

的妨害那地方的人的自由，也是坏事。（中略）我们不但对于使别国变成亡国属国的事，没有兴趣，而且觉得从心底里出来的反感。（中略）倘要别国做属国或亡国，换一句话，就是要别国人做亡国之民，是应该羞耻的事。我们倘若为此而战，便违背了人类的意志，我们单为要免做亡国民这一事，才该战争。（《鲁迅全集》第4卷，页2278）

一个死在战场上的鬼魂讲了上述的话。他强调世界上唯一能够承认的战争只有为不做属国、不做亡国奴而战的战争。其他的战争都应该反对。他指责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等列强帝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其中有丁国对青岛、朝鲜的侵略，这个丁国指日本，他批判日本侵略青岛、朝鲜是可耻的、僭越的事。为什么是可耻的、僭越的呢？就是因为奴役他国、占领他国，是出于国家的利己和贪欲，是违背人类意志的。他还指出“夺别国的领土，拿了别国国民做自己的国民，这是不合理的，无论如何不该做的。”实际上他的这一段话就是在指责日本吞并朝鲜是不合理的。于耀明氏曾对这个鬼魂的话指出：“我觉得这无论如何首先就是对日本的‘韩日合并’即侵略朝鲜的行为的强烈的批判了。”<sup>18)</sup>正如于氏所说，武者小路通过鬼魂的嘴指责了日本对朝鲜、青岛的侵略行为，虽然他用了‘丁国’一词，但也足以让读者明白这是在指涉日本。武者小路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个人、人类的三者中应以人类为最高基准，希求和平、友爱是整个人类的意志，国家和个人都不能违背这个人类的意志。国与国之间应以互相尊重的态度相待。个人与国家也不是单纯的隶属关系，国家不能压迫个人的利益，个人要向着人类的高度进步。

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中赞扬：《一个青年的梦》“意思很透彻，信心很坚固，声音也很真。”并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鲁迅全集》第10卷，页192）鲁迅对武者小路的认同不只限制在中日朝三个国家的关系上，还放眼世界，针对着所有列强帝国的侵略，反对任何以强欺弱的国家利己主义。同时重视人性的自觉，强调人类意识，宣扬人道、和平的精神。

鲁迅译完《一个青年的梦》后，又写了《译者序二》，追申自己的感想。“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此书，中国人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

18) 于耀明，《周作人与日本近代文学》，朝林书房，2001，页116。

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论及日本吞并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同前，页195) 这里他举了日本吞并朝鲜的事例，指出一些中国人指责日本，说出“朝鲜本我藩属”的话，仍然将朝鲜看做中国的属国，鲁迅批评这就是“只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实际上在意识上是与日本不分上下的。这正是他从日本留学以来一直注意的“中国旧思想的痼疾”。认识和克服“中国旧思想的痼疾”是鲁迅所有创作和翻译在精神上追求的最终目的。

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用了象征、双关和第二人称的手法来表现作者对朝鲜的同情和自警。正如第二章中所分析的，小说中朝鲜青年李孟汉讲述朝鲜亡国后的悲惨状况时，特用了第二人称「你」「你们」，将读者拉进叙事中来，刻意要以朝鲜的悲哀暗示中国的将来，唤起中国民众的觉醒。在作品的结尾，李孟汉的叙述结束的时候，文本中出现这样一段描写：

李孟汉将话说到此地，忽然出去找朋友的C君回来了。C君淋了一身的雪，好像一个白鹭鹭一样，我们忽然将注意点挪到他的身上——我们的谈话也就中止了。(页341)

这里C君的出现和众人的注意点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双关的暗示，即，C君是中国留学生，暗示着中国，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他，实际上意味着由朝鲜的悲哀故事转到对中国的注目；表示了作者以朝鲜为反面镜子，反照中国将要面临的危机。

### (三)，对反抗的民族精神的赞扬

五四时期的韩人题材小说均以各种形式描写出韩半岛人民的民族性格，他们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对血统有着很强的意识，爱憎鲜明。朝鲜亡国后，逃亡到日本、中国、俄国的朝鲜爱国青年对祖国的灾难无限悲哀，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无限仇恨。他们有的胸怀复仇的壮志，有的以弱抵强，为国挺身。对他们的这种反抗行为和精神的描写，反映了中国作家对朝鲜民族的反抗的民族精神的赞扬。

蒋光慈的《鸭绿江上》中描写朝鲜青年李孟汉的父亲因为“是一个热心恢复高丽的

人”而被日本当局杀害；恋人云姑因为参加工人运动组织活动，被日本军逮捕，屈死在牢中。悲痛不已的李孟汉发誓说：

我虽然有无涯际的悲哀，但我还抱着热烈的希望。我知道我的云姑是为着高丽死的，我要解放高丽，也就是安慰我云姑灵魂，也就是为她报仇。（《蒋光慈选集》，页323）

李孟汉的亲人、恋人虽然都被日本军害死了，但他们代表了朝鲜人民坚强无畏的精神，通过小说告诉人们被奴役的朝鲜人民仍然着一颗抵抗的心。

台静农的《我的邻居》中的朝鲜青年更是一个勇敢的反日青年。在小说中，这个青年没有姓名，但他隐约地体现了在日社会主义运动家朴烈的形象。如前章所述，这个朝鲜青年在相貌上、性格上都与朴烈有着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他在东京谋炸皇宫，正是朴烈被逮捕的罪名。因此我们可以说台静农将朴烈投影到作品中的朝鲜青年身上，试图塑造一个勇敢的反日朝鲜人的形象。‘韩日合并’后朝鲜人民被逼得家破人亡，四处流亡。但有压迫的地方就一定要有反抗。朝鲜人民以弱抵强，往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但他们不折不挠，继续抵抗。小说中的朝鲜青年以矮小的身躯去行谋炸皇宫的复仇，就反映了朝鲜人民的这种不屈的精神。作品中中国青年「我」对朝鲜邻居的认识和想像由浅入深，再经过一次回忆的唤起，逐渐鲜明起来。朝鲜青年被逮捕时，「我」非常愤怒，“心中的火焰狂烧着”，“痛恨这一群野兽们将我的不幸的异国朋友掠去了！”在记忆起这个朝鲜青年时，「我」感叹到：“为了你的复仇，作了这伟大的牺牲，我的不幸的朋友！”在我的这样的感情中都呈现出作者对朝鲜人民的反抗精神的赞扬和感佩。

鲁迅的《一个青年的梦》中虽然没有触及到朝鲜人民的反抗，但他对原作者武者小路实笃反对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曾表示了极大的赞同。武者小路在《一个青年的梦》自序中说：“我是同情战争的牺牲者、爱和平的少数人中的一个。提起战争，世界上的人马上就会想到日本人。但即便是日本人也绝不是好战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如此下去，实在可怕。这是世界上谁都感觉到的，但只是感觉到也无益，我也知道说出来也没用，但是不说更觉得不释然。”（《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2卷，页499）武者小路实笃在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愿望，将它们寄托到作品中去，通过战争的牺牲者、死者的亲人、朋友和做为主角的日本青年来表现出来。

周作人在《读武者小路实笃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中，鲁迅在《译者序》中，对

武者小路反战精神都表示了强烈的共鸣，他们一致赞扬武者小路敢于反对日本侵略，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鲁迅说：“现在还没有多人大叫，半夜里上了高楼撞一通警钟。日本人却早有人叫了。他们总之幸福。”（《鲁迅全集》第10卷，页192）很明显，他们的共鸣是基于更高一层的理想即对人类和平的希求。为了这一层理想站起来反对战争，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都是值得赞扬的。周氏兄弟之所以共鸣于武者小路，就是因为他的主张是与人类和平的理想相通的，他作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在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后，中国民众对朝鲜人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给了高度的评价，傅斯年在《朝鲜独立运动中新教训》（1919年4月1日《新潮》）中总结的第二条教训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他同时反省到：“中国此刻最可虑的现象，就是社会上一般的人，对于改革事业，总是虑到不可能。——这是中国人万劫不复的命运的定案。看看朝鲜人的坚固毅力，我们不真要惭到无以自容的地步了。”在当时，这样的自我反省对中国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充实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力量。鲁迅翻译《一个青年的梦》，又是从另一个角度——日本——来体现反战的精神，像武者小路那样“擎出火把，”撞一通警钟。唤起中国民众的觉醒。

#### 四、结论

以上我们对五四时期韩人题材的小说作了较具体的作品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这类小说的几个基本特点。首先在创作背景上它们都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局势紧密关连。郭沫若的《牧羊哀话》受到山东问题的冲击而作，涉及朝鲜的则是三一独立运动与李垠的婚姻；鲁迅的《一个青年的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为背景；蒋光慈的《鸭绿江上》以“韩日合并”与那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为背景；台静农的《我的邻居》则涉及到东京大地震、虐杀朝鲜人事件和朴烈事件。每个作品都在与国际形势紧密关联的同时还意识到了具体的历史事件。

在题材上每个作品都从创作背景中取材，并加上作者的想像和文学处理。《牧羊哀话》构思了少年少女尹子英与闵佩薰的悲恋故事，描写了朝鲜的国破家亡的悲哀。《鸭绿江上》的题材与《牧羊哀话》有近似的方面，也构思了一对朝鲜恋人离散的故事。

《我的邻居》则以一个朝鲜青年的逃亡和复仇为题材，描写了朝鲜人民的坚韧反抗。作品中多描写流亡到中国、日本、俄国的朝鲜人，而且以青年为主。描写故事围绕着青年，着重于恋爱，友谊。这样的人物、故事情节的设定，与作者们自己的体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鲁迅、郭沫若、蒋光慈在留学时代经历的个性解放，自我的觉醒，自由恋爱等，都为作品的构思打下了丰富的基础。同时也反映了五四时代勃勃腾起的青春的气息。

在体裁和描写手法上，通观以上作品，均用第一人称「我」来主导故事的展开，而具体的故事情节多以主要人物朝鲜人的叙事为主。即外层叙述和内层叙述、双重构造的框架小说的形式。如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鸭绿江上》的叙事中还多用了第二人称，扩大受述者的范围，充实了叙述的效果。台静农的《我的邻居》也是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来描写了「我」对邻居——一个朝鲜青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作者很少有亲临朝鲜体验生活的机会，他们基本上是通过报道或逃亡到中国、日本来的朝鲜人了解朝鲜的情况。郭沫若虽在东渡日本时路径朝鲜，在釜山住了一周，但还不能深入朝鲜社会的深层。他在日本留学的几年中从日本方面观察了朝鲜，与其他中国作家相比他确实有了更宽的观察视角，但总的来说郭沫若也是通过报道和传闻来了解朝鲜的。故而他们的作品中便都采取了第一人称，「我」来听内层叙述者——朝鲜人——叙述的故事。表现了作者较强的主观性和想像意识。

在作品的主题上，所有的作品都本着一个基本的基调，那就是对朝鲜的同情，对日帝的愤恨。但各个作品又各具自己的个性。如郭沫若的《牧羊哀话》突出了悲恋和反日的主题，表现了受奴役和反抗的悲壮的美。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强烈地反映出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的悲哀。鲁迅的《一个青年的梦》则着重宣传原作的反战精神。台静农的《我的邻居》表现了「我」对朝鲜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的同情和支持。

五四时期韩人题材小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作者突出了他们的个性，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中国、日本、莫斯科)来关注朝鲜，描写朝鲜。他们大多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有机会从中国以外的角度来观察朝鲜，来看世界，这样的经历就扩大了他们视野，他们看到了亚洲有许多弱小民族已被列强国家吞并，中国也在面临着危机，中国与其他弱小民族是命运共同体。这样就加强了他们对朝鲜的连带感。

通过上述作品我们可以了解五四时期的作家是如何认识朝鲜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中国的作家们对朝鲜的命运是非常关注的，朝鲜的亡国是因为日本的吞并，受着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没有自由，不能反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对这一点作家们都有共同的认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强了中国人民的危机感，邻国朝鲜的命运也更加吸引他们的注目。五四运动时中国民众在爱国运动中多以朝鲜为例，揭露日本帝国的野心，唤起人民的觉醒。五四时期中国的对韩认识有两个倾向，一个是将朝鲜做为反面镜子，反照中国的未来，激起忧国的危机感，这样的看法在当时占着主流。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中都有这样的意识存在。还有一种倾向出现于朝鲜三一独立运动以后，将朝鲜做为正面镜子，赞扬朝鲜人民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以此鼓动中国人民的爱国反帝。台静农的《我的邻居》中对朝鲜青年的复仇的同情和支持就反映了这样的认识。当然这两个倾向都基于对朝鲜的唇齿相依的连带感，是将朝鲜与中国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的。

## 参考书目

-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十四院校编辑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中国近现代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  
狭间直树,《五四运动序说》,同朋社,1982。  
姜在彦,《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社会与抵抗》,未来社,1982。  
赵芝熏,《韩国民族运动史》,高丽书林,1975。  
森川哲郎,《朝鲜独立运动暗杀史》,三一书房,1976。  
金一勉,《朴烈》,合同出版,1973。  
彭泽同,《中国现代史》,泰流社。  
——,《五四纪念文辑》,东北大学,1950。  
丁守和,《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79。  
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五·四运动史像的再检讨》,中央大学,1986。  
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南开大学,1993。

### 杂志

- 《每周评论》  
《国民》  
《新潮》  
《世界历史》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第51册。  
《新青年》  
《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新中国》，第7期，1919。
- 《创造十年》（「郭沫若自传」第2卷），三联书店，1987。
- 王繼权編，《郭沫若年譜》，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 《英亲王李垕传——李王朝最后的皇太子》，共荣书房，1978。
- 本田节子《朝鲜最后的皇太子妃》，文艺春秋，1991。
- 《历的百科辞典》，新人物往来社，1993。
- 《东京日日新闻》
- 《九州日日新闻》
- 大町桂月，《金刚山游记》，「桂月全集」第3卷，兴文社。
- 《日本的历史》，中央公论社，1966。
-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武者小路实笃，《武者小路实笃全集》，小学馆，1988。
- 于耀明，《周作人与日本近代文学》
- 《中国文学家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 《蒋光慈选集》，开明书店，1951。
- 《中国新文学作品选》，北京语言学院，1980。
- 蒋光慈，《鸭绿江上》，亚东图书馆，1927。
-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民文学出版社，2001。
- 台静农，《地之子》，未名社，1928。
- 《近代日本综合年表》，岩波书店，1984。
- 学灯，《时事新报》副刊，1920。
- 《东京日日新闻》
- 《九州日日新闻》
- 武田幸男，《朝鲜史》，山川出版，1985。
- 朝鲜史研究会，《朝鲜的历史》，三省堂，1974。
- 《中国新文学大系》

## Abstract

Outline The epic technique of Chinese novels about Korea and the recognition of Korea during the 5.4 movement--A Study on the Changes in Understanding of Korea & Narrate of the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n 20th Century (2)

Rina Fujita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is the Chinese novels about Korea written during the 5.4 movement. This essay i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pic technique of these novel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Korea during the 5.4 recognition. For example Guo Moruo's *A Sad Story of A Cowgirl*, Jiang Guang Ci's *By the side of Yalu river*, Tai Jingnong's *My Neighbor*, These works are se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lonial Korea before and after the 3.1.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Regarding the characters and the plots, every work has young main characters who sought political asylum in China, Russia and Japan. These novels represent their love, friendship, their political exile and their resistance to Japan. The subject has one basic motif, which is sympathy for Korea and resentment towards Japan. As for the epic technique, the first person "I" is used continuously. The novel has the main character of Korea tell the story. So this kind of novel has the structure of both the exterior epic and the interior epic.

Each author in that age had a strong personality by comparison with those before the 5.4 movement. They observed and described Korea from another side, from China, Japan and Russia. They had experiences of studying abroad and opportunities to observe the world outside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lesser countries in Asia were invaded by more powerful countries, and China was also faced with this danger. Strengthened by their apprehension, they started to have a sense of solidarity with Korea and the invaded countries. Chinese authors had

two attitudes toward the recognition of Korea during the 5.4 movement. One is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Korea on the future of China for example, Go Moruo's < A Sad Story of A Cowgirl >, and Jiang Guang Ci's < By the side of Yalu river >. The other attitude appeared after 3.1. independent movement. That is the attitude regarding as the model is Korea, praising the Korean rebel spirit toward Japan and encouraging the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of Chinese people. < My neighbor > by Tai Jing Nong expresses these. To be sure, these two attitudes are built on the solidarity with Korea. They connect the destiny of Chinese and Korean movement with these works.

Key Words : 3.1 independent movement, solidarity